

论丰子恺的音乐教育“童心说”

王岚 刘建东¹

(嘉兴学院 师范学院, 浙江 平湖 314200)

【摘要】: 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是中国传统思想耦合现代西方艺术精神的产物,是李贽观点在现代社会的新阐发、新发展。其核心是要以音乐来陶冶儿童天真烂漫的情感世界,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,造就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,显现了一个深谙音乐艺术本质的现代艺术家的崇高美育情怀:无论是在初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实践,还是出版儿童音乐读物和编写学校音乐教材,都重视儿童音乐教育的一贯思想。音乐教育的“童心说”,在我国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下极富社会改造意义,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,并且对当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: 丰子恺 童心说 音乐教育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J605.5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19)04-0027-05

丰子恺博学多才、艺兼众美,不但在散文、漫画创作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,其在音乐领域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。他在音乐领域的成就与贡献概括起来包括两大方面:一是音乐教育方面,丰子恺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亲历学校音乐教育实践,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思想,更是指引了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;二是对西方音乐理论的译介,虽然音乐理论的译介谈不上原创的理论高度,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,丰子恺的西方音乐理论译介不但丰富和繁荣了中国的音乐生活,更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了西乐东渐的历史进程,促进了中国社会音乐发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。

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,丰子恺有近20年的时间在从事学校音乐教学工作,任教的范围遍及初级中学、中等艺术师范以及高等学校,尤其是在普通中学和艺术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学,是他一生音乐教育实践的最重要舞台。抗战结束后,丰子恺逐渐远离了课堂和讲台,但他并没有忘却自己的音乐审美理想和抱负,而是在另一条战线——通过出版音乐著作的方式,继续实践他的音乐审美理想。直至1949年后,年过五十的丰子恺仍坚持自学俄文,译介俄文音乐著作和音乐教材,为新中国的社会音乐及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孜孜不倦地工作着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学堂乐歌的引进拉开了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幕,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,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经历了传统音乐教育、学堂乐歌、西式音乐教育、黎锦晖歌舞音乐、抗战歌咏,以及以丰子恺为代表的艺术审美教育,历史地看,藐视传统音乐教育者有之、改进学堂乐歌教育者有之、垢病西式音乐教育者有之、讨伐黎氏歌舞音乐者更有之,但不可否认,丰子恺的审美音乐教育思想却较好地传承了下来,原因不外乎是丰子恺科学地认识到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审美本质,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不但指引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,同时,对当今“以审美为核心”的学校音乐教育也不无指导意义和价值。“童心说”是丰子恺重要的思想理念之一,它不但贯穿了丰子恺国民音乐教育实践的全过程,更指引了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进步的方向。

一、丰子恺音乐教育“童心说”的内涵

¹**基金项目:**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(17NDJC096YB)

作者简介: 王岚(1979-),女,江苏徐州人,嘉兴学院师范学院助教,硕士,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;刘建东(1971-),男,浙江桐乡人,嘉兴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音乐与音乐美学。

网络出版时间:2019-04-30 16:57:18 网络出版地址: <http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/33.1273.Z.20190430.1534.008.html>

1927 年，丰子恺在译作《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》^[1]之序言中直陈，成人世界，一切以大人本位，普遍认为服从、遵照大人的意愿，是懂事、明理的表现；反之，则是“小孩子”的行为，必然招致大人的教育、训斥。而这种儿童的教育方式在成人世界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，是儿童走向成熟、发展成长的必然过程。然而丰子恺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要以成人世界对待儿童的惯常做法来警示人们，儿童的生活与情感世界不同于成人，却是最纯真的，以成人的标准和惯常做法来要求和规范儿童的行为，必然会扭曲儿童的自然成长规律和生活状态。在丰子恺看来，这般儿童教育方式是有违儿童的天性的，儿童教育非但不应如此，而是要充分顺应儿童的天性，保护儿童自然、本真、纯洁的心灵，使儿童不失本真之心、不失“童心”。他认为，保护和培养儿童的“童心”，最适宜的途径就是宗教和艺术。客观地看，通过宗教来护养儿童的“童心”有其理想中积极的一面，但宗教思想不免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，譬如宗教道义中“出世”的思想就是一个方面，对一个个体人来讲，“出世”抑或“积极人世”的思想本无可厚非，但倘若作为对社会普遍行为的倡导，则未免有其消极的一面，这或许是丰子恺自己受宗教的感化的结果，而艺术对孩子“童心”的护养确实有着积极的、重要的作用与价值。

丰子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音乐教育经验，又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，对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有着切身体会，虽然身处国弱民困的时代，但社会总要发展，儿童总要成长，因此，人的审美又怎能缺失？学校音乐教育又怎能缺位？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、真挚美好的情感无疑更需要音乐的滋养，用音乐来培植“童心”，用音乐教育来提升民众的审美品位、道德情操，进而改良社会风气，一直是丰子恺的美育理想和抱负，丰子恺认为：“艺术教育就是教人这种做人的态度的，就是教人用像作画、看画的态度来对世界；换言之，就是教人绝缘的方法，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。学做小孩子，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，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。”^[2]丰子恺是个十足的儿童崇拜者，竭力倡导“童心”，把儿童与日月星辰、与艺术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。他不但在散文、漫画创作中将儿童题材作为创作的中心，更倡导以音乐教育来培植儿童的童真世界、审美心灵。丰子恺音乐“童心说”的核心，是要以音乐来陶冶儿童天真烂漫的情感世界，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，造就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，显现了一个深谙音乐艺术本质的现代艺术家的崇高美育情怀。

二、“童心说”的历史渊源

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“童心说”的思想家是明代的李贽，理论上最有影响的也当属李贽的“童心说”，他对“童心说”有一段经典的论述：“夫童心者，真心也；若以童心为不可，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真也。若夫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，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”^[3]

童心即真心，绝假纯真的自然人性，尤其在儿童身上表现得一览无余。李贽的“童心说”与丰子恺“童心说”有一致的地方。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丰子恺“童心说”的关注升温，也有学者将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与李贽的“童心说”观点相比较，认为丰子恺“童心说”的观点是受李贽思想的影响。事实上丰子恺“童心说”与李贽的观点有相一致的地方，但毕竟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，“李贽要在明朝末年这个程朱理学和王氏心学占统治的年代，追求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，以童心说做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启蒙”^[4]，李贽“童心说”是封建时代开启人们思想启蒙的钥匙，在中国历史上极富进步意义，其核心是由“童心”出发，经过层层深入，直达对儒家传统礼教的批判和倡导人的真实情感的自由抒发。

丰子恺自 1914 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起，即师从李叔同开始接触西方音乐，特别是 1921 年在日本游学的经历，使他进一步深入地接触、了解日本社会的音乐教育。自明治时期起，日本教育界深受赫尔巴特学派理论的影响，对西方音乐及音乐教育精神呈现出顶礼膜拜的景象，认为音乐艺术“可以培养儿童关于美、国家及道德等多方面的兴趣”^[5]，在日本社会浓厚艺术气氛的感染下，丰子恺积极摄取西方音乐教育的理论精华，这也对丰子恺音乐“童心说”的理念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清末民初国弱民困的中国社会，丰子恺的音乐“童心说”是要通过普及音乐艺术教育，传递美育精神，开启国民智慧，实现改造国民性的理想。所以，与其说丰子恺继承了李贽“童心说”的观点，还不如说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是中国传统思想耦合现代西方艺术精神的产物，是李贽观点在当代社会的新阐发、新发展。

三、音乐教育“童心说”的实践

丰子恺认为学习音乐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“会唱会弹”几首曲子，而是通过学习音乐掌握一门技术的同时，使人人都具有儿童般纯洁的心灵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强调的是发自心底的、真情流露的自然人性，而音乐又是抒发情感的，二者就是最完美的结合，不能把音乐单纯地作为一种娱乐炫技的工具。丰子恺曾说：“大人们弄音乐，不过一时鉴赏音乐的美，好像喝一杯美酒，以求一时的陶醉。儿童唱歌与成人不同，全心投入于其中，而终身服膺勿失。我想，安得无数优美健全的歌曲，交付于无数素养丰足的音乐教师，使他传授给普天下无数天真烂漫的童男童女，假如能够这样，次代的世间一定比现在和平幸福得多。”^[6]

20 世纪 20 年代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，丰子恺同时担任英语和艺术课程的教职，随着学校办学声誉的不断提升，学生数量逐年增加，丰子恺把英语课程转交给其他老师任教，从而专事艺术科的教学，这些艺术科目中就包括钢琴、声乐、器乐和音乐理论等。之所以更专注于艺术科目的教学实践，是因为他始终认为“艺术科是情底方面的东西，是心底的流露。”^[7]而这种“真情的流露”正迎合了他倡导的“童心说”的教育原则。

1939 年 4 月，在结束了桂林师范学校的教职后，丰子恺转而投身到了浙江大学的审美教育实践之中，实现了学校音乐、艺术审美教育从普通中小学向高等学校的延伸，但依然十分关注儿童们的音乐教育。1939 年 5 月，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转来民国教育部关于中学课程设置安排的讨论稿，嘱咐丰子恺对艺术课程的设置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他提出将初级中学的音乐课时由原来的 1 小时延长至 2 小时，理由是：“音乐亲和力最大，最善于统制群众感情，团结民族精神。抗战建国之时，尤不可忽。”^[8]

丰子恺不仅在课堂上精心给学生授课，还安排“课外演讲会”，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的“五夜讲话”即是丰子恺音乐艺术课堂教学实践的有效延伸。通过“五夜讲话”向学生们介绍与此相关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，既给学生普及了音乐常识、开阔了音乐视野，又使音乐课得到了扩展和加强；学生们非但没有感觉到枯燥乏味，反而因为这些素材就是自己身边的事物而倍感亲切，既引发自身对音乐的兴趣，也唤起对大自然的共鸣，激发了内心由接近自然而产生的主观方面的“真”“善”“美”。

从早期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（主要培养初等学堂的音乐教师），到后来的春晖中学与立达学园，丰子恺主要的教育对象都是指向儿童音乐教育。1949 年后，虽然远离了音乐教育实践，然而他通过著书立说和翻译苏联音乐教育著作的途径，继续实践他的儿童音乐教育理念，如他翻译了《幼儿园音乐教学法》（1954）、《幼儿园音乐教育》（1956）、《小学音乐教学法》（1956）等十多本音乐参考书，还同杨民望一起编著《幼童唱游》（1951）、《小朋友唱歌》等儿童歌曲集，其宗旨和内容依然指向的是孩子们的音乐、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及“童心”的培植。

丰子恺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的情感陶冶和道德感化的作用，提倡从儿童时代开始注重培养音乐审美能力，的确能收到好的教育功效。正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音乐教育的美育本质，因此，他尤其关注儿童音乐美感的培养，注重音乐对于儿童娱乐、陶冶情操和寓教于乐的效能。“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”^[9]，无论是在初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实践，还是出版儿童音乐读物和编写学校音乐教材，都贯穿了丰子恺重视儿童音乐教育的一贯思想。丰子恺音乐教育的“童心说”，在我国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下极富社会改造意义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并且对当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四、结语

儿童阶段是人生的萌芽时期，未受任何礼数和规矩的影响，充满了纯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，好奇心是肥沃的土壤，它滋润着创造力的生长，而创造力就是好奇心的果实。丰子恺在音乐教育中始终以“兴趣”与“好奇心”作为动力，以大众为服务对象，将以“真、善、美”为核心贯穿于整个音乐教学与实践，在“童心说”教育理念的引导下，提高了学生的兴趣，并以他们为载体向大众传播音乐教育思想，全面提升全民的素质、审美能力，从艺术审美中得到更多的知识，培养高尚的人格修养和情操。

现今，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，音乐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、教育规模、师资水平等都得到了全方

位的提升。在当下全社会十分关注学校美育的时代背景下，音乐教育尤其承担着更为核心的责任，每一个孩子都或多或少地学习声乐、舞蹈或者器乐等，市面上少儿艺术培训机构也开办得如火如荼，但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在欣喜地看到这一现象的同时，也不免担忧，因为大多数人只是生搬硬套地学会几首曲子而已。

丰子恺说：“不识乐谱，不会弹琴唱歌，固然无从研究音乐；但倘然对于音乐的观念不明了，学习方法不当，即使熟识乐谱，会唱歌弹琴，也绝不是真懂音乐。”^[10]正因为没有真正地“懂音乐”，而音乐又是“表达抒发情感”的，所以心底里那份应该“自然流露的感情”也就无从说起，也就没有了真正的音乐。音乐教育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就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性教育，特别强调的是个体的差异和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特点。因此，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要求成人保护每一个孩童的“自然真心”这颗没有修饰的种子。“童心是教育的根，赋予教育生命和活力。

重新认识被遮蔽的童心正是现代精神异化的药方，回归童心的教育也就是从教育的途径来引导人寻求精神的回归，在传递人类文明、促进现代化知识技术发展的同时，也引导人回归本真、形成真纯的人格，这意味着教育要焕发童心原初的生命激情，让儿童以及成人都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。”^[11]社会飞速发展，日新月异，人类被捆绑在时光的车轮上急速前进，无暇欣赏周边的风景，只是无谓地跟着大多数人的脚步奔跑前进。丰子恺先生的“童心说”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，用纯洁的童真唤醒成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回归，让飞速的车轮慢下来，让躁动的内心静下来。

音乐以其艺术形象的直观性、鲜明性和富于表现力，不仅使儿童易于接受，更易引起幼儿情感上的共鸣，对提升儿童审美能力有着学校教育中其他科目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，如何在顺应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前提下，让音乐艺术教育成为培植幼儿美好心灵、养成健康高尚的音乐审美习性、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有力载体，丰子恺的音乐“童心说”对于现今音乐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，无疑值得我们在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加以借鉴和运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关宽之. 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[J]. 教育杂志, 1927(5/6).
- [2] 丰陈宝, 丰一吟, 丰元草. 丰子恺文集: 艺术卷[M].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1990: 253.
- [3] 李贽. 焚书续焚书[M]//李贽文集: 3卷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: 98.
- [4] 李悦平. 论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中的“童心说”——兼与李贽“童心说”美学思想之比较[J]. 四川戏剧, 2015(4): 168-171.
- [5] 高崢. 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[M].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; 2009: 46.
- [6] 丰华瞻, 戚志蓉. 丰子恺论艺术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1985: 282.
- [7] 陈净野. 丰子恺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[M].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2: 67.
- [8] 丰子悟. 教师日记[M]. 北京: 教育科学出版社. 2008: 170.
- [9] 刘建东. 浙籍名人与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[M].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4: 124.
- [10] 丰子恺. 音乐入门[M]. 上海: 开明书店, 1927: 1.

[11] 高榆. 丰子恺“童心说”的教育意蕴[D]. 长沙: 湖南师范大学, 2009: 3.